

十年一觉香港梦

沈朗





阮 朗

十年一觉香港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是香港著名作家阮朗，近年来继《香港风情》、《黑裙》之后，在国内出版的又一个小说集子。

作品以港澳为背景，真实地反映了被称为“世界之窗”的香港变迁和面貌。其中有对底层社会小人物命运的同情，有对上层社会绅士丑恶灵魂的鞭挞，更主要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渊数，抒发港澳同胞的思乡念土之情。

作者阅历丰富，观察敏锐，文笔老练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独具特色的香港风情画。

十年一觉香港梦

阮 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3.25印张 插页2 274千字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13,000册

书号：8113·684 定价：1.02元

目 录

迎春花开	1
铁 将 军	19
后 台	38
案 底	65
杀手初出击	93
一对宝贝	112
受惊的人	132
误 会	144
小薛保的大耻辱	153
黑兵汤普生	165
蛇 牙	192
四碟小点心	225
厌	225
失	232
痒	240
憾	249
十年一觉香港梦	259
靚 女	275

迎春花开

喜欢花，可不懂得养花，更记不住花的名字。对于一个生长在“花果山”的人来说，常有“乍见故人难呼其名”的困窘，这份难堪十分辛辣。

譬如那天同三几个老朋友和年轻朋友到沙田郊游，下了巴士上“车公庙”打了个转，年轻人嚷着要去探访那位风雨无阻，成年盼望丈夫归航的“石妇”，我们几个都已给阳光晒得冒汗，除了贪婪地多望一眼田野和海岸，就想喝些什么，而泥土的芳香又联想到吃，于是约好在前面那家菜馆等他们一起晚餐，我们就忙不迭进去喝啤酒。

可能是假日，又可能是新的一年就要在几十小时之后到来，这家小饭店里有着一大批郊游顾客，紧挨在我们身边的那

桌，看来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该读小学的孩子，而迅速使我们感到生趣盎然的，是有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束花，他的父亲正在问伙计要一个空酒瓶，由他自己去洗干净，带回去。

“这花好面熟，”我说：“花是黄的，叶是绿的，不过它的名字……”

朋友们都笑出声来。老陈说：“还算不错，你没醉，没说花是黑的，叶是白的……”

“喝完再说，”老王举杯：“反正凡是花，都认识你张先生，你，可都不认识它们咯！”

我当然不干，告诉他们，我还认识不少花哩！海棠、含笑、菊、兰、梅、莲、枇杷花、葵花、鸡冠花、菜花……

老陈是我们中间的园艺家，他指指孩子手里的花，说：

“啤酒你请，我来说。好吗？——好！那我告诉你，这是迎春花。”

“哦，迎春花！”

“你懂？”

“不不，刚懂，刚懂。”

“迎春花有两种，”笑声里他有板有眼地说：“瞧，这一种属于小灌木，茎上都非常纤细，拖得长长地象根藤蔓似的，叶是复叶，早春开黄花，有六瓣，花比叶先开，是春花里最早开花的一种——”

“所以叫迎春花——”

“又来了，你懂？”

“哦哦，刚懂，刚懂。”

“另外一种呢？”老王问。

“另外一种迎春花，”老陈道：“属于落叶乔木，树高好几丈，花刚开时尖锐得象个笔尖，所以又叫‘木笔’，叶子象柿叶，稍为狭长些，春初开花有紫白两色，足足有莲花那么大——”

“莲花我认得。”

“那你说下去，我乐得喝酒。”

“哎哎，听你说迎春花嘛！”

“那种花比酒还香咧！”老陈“啧啧”地赞叹：“真的是香味馥郁！”

“玉兰花！”老王道：“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又不是。”老陈道：“花王叫它辛夷玉兰，玉兰花九瓣，长些；辛夷六瓣，短些，可是阔一些，它们也都叫迎春花。”

人们的注意力移到邻座那个酒瓶里的小黄花上，我在注视它是否复叶，但是当眼光接触到那个孩子的父亲时，我几乎傻了——是个熟人，可又说不上名字。那是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，微胖、矮小，看来扎实，眉毛和眼睛都很长，这是他使我留下印象的特征。

他也一怔——肯定他对我还有点“印象”。

朋友们都在笑。——笑什么？我知道。笑我不但认不得迎春花，而且连同来迎春的熟人，也叫不出名字了。

但是，相距不过一二呎，双方不可能扭过头算了，这位年轻人站了起来，伸过手来，用带点四川音的普通话说：

“久违久违！”马上掏给我一张名片：“彭家璧 香港宇宙洋行业务部经理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脸上发烫：“我没带名片，我是张浩。我记起来了，你的老太爷……”

“这是内人，”他立刻给我介绍他的妻子、孩子，我也不能不把老朋友介绍给他。但当老王老陈低声问我这是个什么样的熟人时，我只能含含糊糊苦笑，答应他们慢慢再给“讲古”了。

那是一九五一年新年假期间的事了。

香港大酒店的“鳄鱼潭”还在。

我从报馆“转行”，在几间学校教几点钟课，因为放假，和一位长辈到“鳄鱼潭”闲聊。

古老、宽敞的大厅，厚厚的地毯，长长的沙发，不论熟人陌生人，在一个地方甚至一张长沙发上要点饮料，吃些西点，并不显得拥挤。因为赶上新年，刚过圣诞假期，大酒店的壁饰和瓶花什么的，洋溢着迎春的喜气。中外客人三三两两各自谈心，我正在向那位长辈说些近况，冷不防一个高大肥胖、满嘴酒味的中年人，三脚两步从对面迈到了我跟前。

“哈！哥子！是你呀！你好哇！”

“哦！”我一怔，迅速辨清了他是原蒋军第七十军整编的七十师政治部主任，姓杨。那是当我在一家报馆工作，给派到华东内战前线采访时，在苏北涟水战场认识的，那个师的师长张灵甫和他这个政治部主任，对我们那

批战地记者特别“好”，希望“用哥子生花妙笔，替我们主持公道嘛！”发动内战弄了个搬起砖头自压脚，还要人家“主持公道”，这种“公道”在我来说，是恁地也没办法“主持”的了。不过那是一九四六年大雪纷飞时的事，直到一九五一年，在我工作的报纸上没半个字“捧场”，张灵甫已经被歼孟良崮，当年的“杨主任”又来到了香港，不会“冤家路窄，兴师问罪”罢？于是我打量了这位曾挂“中将衔”者一眼，好家伙，当年他们是“最新式配备”，今天他尽管孑然一身，可是那套西装，以及那件大衣，按照当时的物价，我这个穷教员不吃不喝不要床位，也得干上两年，而且还不包括他的那双名贵皮鞋，手上的钻戒，特地滑出手腕的白金名表，以及一如当年他那条横斜小皮带似的，挂在胸前背心口袋里的黄澄澄金链在内。

“哦哦，杨先生，既发福，又发财啦！”

“龟儿子，金子生意硬是要得！”他忽地把肥手一指：“娃儿，过来！叫张伯伯！”

于是一个少年从对面跑了过来，立在我们面前，腼腆地、悄悄地叫我：“张伯伯！”还行了个礼。

“都来啦？”我有些困窘：“这是最大的少君罢？”

“对，他是老大，——对，哥子，我不姓杨姓彭，我的老大叫彭家璧，”接着当面“训子”道：“张伯伯——对，你现在做啥子呀？还在那家报馆吗？”

“我在教书，”我说：“已改行了。”

“也好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只有你们那家报纸不给面子，那一年你们走后，我一直留心报纸，家家都有七

十师‘捷报频传’的消息，你们没登，龟儿子硬是要不得！”一下子可又扯到了这个：“哥子，今天幸会！我们刚刚在上面喝完喜酒，下来喝点咖啡，咖啡哟，哥子再来一杯，我请客，今天不算，二天你到大道中我铺子里来。”接着塞给我一张名片说：“大家在外面跑，出外靠朋友嘛，哥子你今后要多多指教——”说完就准备走了。

我送他到门口，看清楚了他的脸胖得近乎浮肿，也看清楚了他儿子羞怯得象个女孩子，有两道好长好长的眉毛，两只好宽好宽的眼睛。

“彭先生，”我当着门口小童问他：“你们的张军长死了，当时你一定受惊了吧？我们在涟水虽然只有大半天，可是看见你和他寸步不离——”

“命嘛！哥子，”他一手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这有啥子办法！当年你们进涟水，全城不是只剩下一个瞎眼婆吗？人家坚壁清野，原来是自己退出的，后来我们就追，从苏北追到鲁南，龟儿子连个影子都没得！老张可得意啦！他攻进涟水已经逾限二十天，这回就想来个歼灭战，面子上好看些，还可以升官嘛！可是我入他先人板板的——”他忽然煞住了，苦笑道：“哥子，二天我们摆龙门阵再说。不要忘记，有啥子金银生意，介绍到大道中找我。”

小童开了门，我一直送上行人道，再问：

“那你怎么离开孟良崗的？你哥子可有本事哪！”

“我根本没上孟良崗，”他把一张肥嘴凑到我耳朵边，沙沙地低声说：“我早看到不是路啦，躺在死人堆里，好不容易爬起来，衣服换了，姓名也换了，不再姓杨改姓

彭，哈哈，个老子还算有点办法。”一挺胸，把大衣一抖，问：“混得还不错吧？好好，二天来我铺子里喝茶。”

我不肯放手，跟着他走。

“你硬是有办法！”我说：“你哥子自己说的，躲在死人堆里逃了出来，那你做生意的本钱又怎样事先弄妥的？”

“你真是！”他的劲儿来了：“我说过，我早看出不是路数！我借口召集政工人员开会，把‘积蓄’派我舅子专差送到了四川，要他姊带着娃儿往香港跑，一路好辛苦，好在我舅子从‘国军’到‘袍哥’的关系都有，——你二天到大道中找我，自己问他嘛，他是我金号的总经理——”又加了句：“孔、宋都顾不了‘他’，我是老几？哈！我更管不了啦！”

没想到会邂逅这个人，回到“鳄鱼潭”，得要向我那个长辈谈谈这件事，陷在那一次罕见的采访过程里，迎春的气氛倏地有异。

当然，一九四六年隆冬的苏北战场采访，是怀着迎春的心情出发的。尽管上海还在深沉的苦难、激烈的动荡之中，尽管此行所写通讯，所发专电在所谓“民主自由”之下既无采访的把握，更无发表的把握，还是欣然就道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“饭碗”，而主要是为了迎接春天的来到，顶上飘着鹅毛大雪，腊梅开在山腰，尽管说这是酷寒的隆冬，但应该承认：春天的讯息是越来越近了。

我只是数以亿计，渴盼摆脱“三座大山”重压的中国

人民之一，个人的安全与否早已不是个问题，而怎样传达春的消息，使大伙儿获得更大的鼓舞，那倒是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重大课题。原来的统治者在“还乡团”之后回去了，乡亲们惦念撤离了的战士的消息。……

在扬州著名的富春楼外，行乞的长龙至少有半华里，内中有一个老翁穿着入殓时用的“寿衣”，也排着队等待施舍，给予人们一个极其尖锐生动的印象：旧社会是该“入殓”了。在仙女庙——那个著名佃农缴粮的地方，不是秋收时节也挤满了扬禾场，原来是衙门要贫雇农补纳无从纳起的各种“欠租”，一个卖儿鬻女，家破人亡的普遍惨剧，又将在愤怒的大地上重演……

在高邮，一个来自徐州的理发师，冒充“专员”获得了果戈里《钦差大人》的戏剧效果。在淮安，凳子还没坐热的统治者，为浆糊未干的《新四军后撤布告》而寝不安枕。在东台，“机械化兵团”一百军（师）李天霞部为恁地打不通通榆公路而无法交差，从上海带去的一群舞女并不等于“最佳装备”，对他更没半点“帮助”。在宿迁，全城成为伤兵收容院，即使“有面子”的旅客住店，也得稍候哪间房里有伤兵咽气。在泗阳，整个城区只是一所废墟，那主要是“B二九”的“战绩”。在淮阴，江苏省政府王懋功派了个“专员”王公屿设了个临时省府办事处，为英勇战士们的后撤，到处寻找南京上海一带的记者：“好材料，帮帮忙，共军已经离开苏北，‘国军’正在‘追奔逐北’，张军长（他们不称张灵甫为师长）刚刚打下涟水，我们请各位到涟水实地采访，看看‘国军的辉煌战绩’。”……

整个苏北不是在雪花飞舞下颤粟，而是在人为的酷寒中动荡！自以为“胜利”了的混毬们一手压善良，一脸“请帮忙”，独独有一个官儿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甚至连话都不屑多说半句，他就是那位“张军长”。

七十师入涟水之后的第二天一早，一串吉普载着十多名战地记者，从淮阴越过七十里崎岖不平的公路，到达官儿们认为应该看看、“大书特书”的“涟水之捷”地区，黄河故道不闻呜咽声，城里几千具双方尸体作了毋须言传的“说明”，特别是掩护主力撤退的战士，已使他们的敌方付出了重大的代价。

一个胖子——“我是政治部杨主任，”率领了七八个人前来迎接，领上“两朵梅花”中将衔，华达呢冬装腰佩“军人魂”短剑，勤务兵给他拿着大衣，他自己一头大汗冒热气，一上来就嚷“哪位是张浩先生，王主任王公屿电话里交代的，张先生是上海大报的记者，张军长和兄弟特别表示欢迎……”然后紧握着我，一忽儿对大伙儿指指涟水宝塔：

“这就是能仁寺十三妹的故事，塔下就是能仁寺，龟儿子我们的大炮穿过这个塔好几次，这个塔硬是没有垮，倒是共军在塔顶的高射机枪，打伤了一架B二九，打下了我们一架驱逐机，这个塔硬是有鬼名堂！”

在城门边，他描绘“共军可不是那么好打的罗！这座城，龟儿子挡住了我们二十天整！他们打得‘刁’呵！也不晓得学的啥子‘孙子兵法’！啍啍，”他背过身子：“这一长列是黄河故道，都是沙子，沙子上面不能筑工

事，龟儿子共军的工事筑得可好，真想不到！张军长已经给‘领袖’去了电报，要求派一个旅长以上的参观团，来涟水看工事来了。……”

踏进涟水城，那个胖子忽地闭了嘴，因为满城瓦砾，房倒屋塌，路也没法走——已经没有路，他这个胖子攀高落低，更加吃力，但还是在说：“我入他先人板板的，共军给打跑了是一回事，老百姓也跑了个干干净净，全城只有一个瞎眼婆，全城可没有一只水缸，没有一口活井，龟儿子连门板床板也没一块，我们喝水都得想办法，硬是伤脑筋，今天张军长请客的酒席，都是从淮阴送来的……”

大伙儿在城角见到了张灵甫，那是一所唯一有门有窗的大屋，两桌酒席摆在那里，铺的是大红桌布，记者们在城边见过还在流血的尸堆，因此人人都难下咽。

张灵甫比这个主任还长得高大，可没他那么肥，一条腿有点跛，踱了两步，沉着脸就坐下，不挨桌子，面对空档，俯腰，双掌下面支了根灰白色粗扁大手杖，还不时在手背上搁下他的下巴，时常抬起头来又搁下去，就象河边石缝里藏了只大癞蛤蟆。

“我们军长”胖主任介绍说：“威名远扬，冈村宁次回日本之前，送给‘领袖’一根手杖，‘领袖’就给了我们军长，在那根手杖上，有这么一行字，‘御’什么的，是日本摔角冠军在天皇面前表演之后，天皇赏给他的。我们军长十分欢喜，成天手不离杖，——大家懂得这意思吗？杖者仗也，‘领袖’对我们军长有倚仗之意——”

突地不远处有炮声：“隆！”

大伙儿一怔。

张灵甫阴暗的方脸上一阵痉挛，忽地说：

“开席！”

“请坐请坐。”胖主任忙不迭招呼客人。

客人面对这块大红布，恁地也开不了胃。

“刚才，是我们的炮，”张灵甫说：“共军没有这种大炮，大家不要慌。”

“共军这回跑哪里去了？”一个南京记者问。

“回山东老根据地去了，”张灵甫瞪着双眼睛：“我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他们的花样是多，现在我张某人可完全明白了，他们打的是运动战，跑得是快，可是笑话来啦！你两条腿跑得再快，能跑得过我们四条腿的汽车？哈哈！还有，他们这一招很绝，那就是不打没把握之仗，以多吃少，以强凌弱，这个不能小看了，可是我张某人不是瞎子，我已经看透了他们那一套。这一回，我就跟他尾巴追！你在跑，我在追，你用两条腿，我有四个轮子，你来不及集中火力，我可来得及个别消灭。”把杯一抬：

“干啦！为我们歼灭完成而干杯！”

邻桌上的主人——胖主任抢着站了起来，打恭作揖，酒泼了一地，然后再斟满了，唱个大诺：“各位请！”

他是干了，客人在彼此咳呛，为什么？大伙儿明白：那块大红桌布在作怪。

两个主人不明白。

“隆隆！”又几声炮响，犹似天边郁雷。

“我们的炮！”张灵甫还在故作镇静：“打了二十多

天，昨天终于攻进来了，嘿！算他有一手，主力跑了，担任掩护的共军也真卖劲，拚上了刀子，我‘叠’他八辈的，拚刀子也在行哩！好，我刚收到一批新武器，叫做火焰喷射器，一百公尺以内，任何金属都会化成水，你断后的还能有多少人！——来，再干一杯！”

——又是一阵干咳。

“嗒嗒嗒嗒……”

——机枪！

战地记者当然有起码的军事常识，如果说炮声真是一方的远距离追击，那机枪是近距离的对攻了——于是不少人站了起来，仓皇四顾，可也见不到有什么特别，灰黯的苍穹哭丧着脸，笼罩着苦难的苏北平原，为强占者作了恶劣的预报，为战斗者作了酝酿另一场大雪的预告——特别是严冬已到，春天在望的预告。

“好了，”张灵甫忽地送客道：“我们要准备追击，今天的招待会到此结束。”

事情往往有奇怪的发展：不少客人忽地不想马上离去，反而开始有说有笑。一个也是来自上海的记者凑在我耳边低声说：

“喂，尝尝当俘虏的滋味也不错。”

吉普马达声响，由于有好几辆，因此这阵发动声掩盖了又一串大炮和机枪声。

客人们大都不肯走，张灵甫可走了，他用那根手杖支持着他大概一百七十多磅的躯体，——不，他的“领袖”用他支持着灯草般的身体，出门拐个弯，上了车，不见了。

“各位各位，”胖主任又忙前忙后起来：“上车罢，战场战场，不是舞场，不好耍哟！张先生请先上车，各位回到淮阴，王主任另有招待。”他挟住我上了吉普，我明白，这是要我做“带头羊”的意思，挤满了五个人，吉普开动，炮声又响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说：

“杨主任，看看两军作战，长长我们见识，也不错嘛！”

“哥子好说，”他向大伙儿陪笑脸：“这不是耍的，万一共军反扑过来——”

“你不是说他们到了山东？”

“对，但是他们还有游击队在这一带，再说他们一高兴来个攻其无备，打一阵又不见了，也不稀奇，不能不防，嗯嗯，不能不防，各位都是京沪名记者，万一有什么乱子，那就不得了，别说我们军长在‘领袖’面前难以交代，就是在全世界报馆之前，政府也难以交代，嘿嘿，不如走罢——”

“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嘛！”有人笑着说。

“甯甯，”胖主任两只手忘戴手套，又红又白，又肥又嫩的大手一个劲儿乱摇：“这不能试，啥都可以试，就是这个不可以试……”

吉普在残垣断壁上颠簸得厉害，一下子卡在城郊一个大窟窿里，车旁正有一簇小红花，有一朵长得特别挺，小得可爱，我一手把它摘了下来，车轮脱出窟窿再往前跑，机枪声更是清晰，根据在抗日战争前线所得的经验，武器使用者距离我们大概只有两华里光景……

“张先生想什么？”胖主任哈哈一笑，“做诗吗？”